热点透析

三问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

□张仕荣

2014年7月1日，日本安倍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认为，即使日本自身未受到攻击，也可以为阻止针对他国的攻击而行使武力。所谓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

尽管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意味着就会马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但该事件就国际层面而言其影响极为负面。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是人类社会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成果之一，并不单纯为日本一国的内部事务，事关整个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与人类社会和平果实的捍卫。其实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早在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中就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订立了相关约束性条款，其中第107条规定：“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现今许多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随着二战的远去，宪章中的107条款只能作为历史的遗迹而留存，但是今天看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将又一次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艰巨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日本的纵容和一些当年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亚洲国家保持静默甚至刻意迎合，不禁使人们产生三重疑问：日本将向何处去？亚太地区的公理和国际秩序如何维护？如何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



一问：日本向何处去

目前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态势明显，虽然不必过度紧张，但是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将发展军事力量并参加海外军事行动，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将实际上成为军队，它使日本可以在没有受到直接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在海外行使武力，这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颠覆性的。与德国相比，日本战后对于军国主义的清算很不彻底，虽然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对制止战争、促进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冷战后迅速形成美苏两大阵营，美国急于拉日本结成美日同盟共同对抗苏联，因此匆匆中止了对日本的政治清算并释放一批包括岸信介在内的甲级战犯，其中岸信介上世纪50年代曾任日本首相，大肆扩充军备，顽固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在血缘上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而安倍在他的《美丽的日本》一书中也毫不讳言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德国同为二战的战败国，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同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世人评论因为勃兰特一跪而使德国由此站起来了。

反观日本，大部分在任领导人对于日本侵略历史含糊其词甚至矢口否认，很难完全取得亚洲被侵略国家的谅解，与欧洲的统合相比，亚洲地区为此一直存在不和谐的声音，而日本一直认为东亚国家包括中国不断揪住历史不放实际上是在刻意打压其国际生存空间。这种所谓的“逆反”表征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指出“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常常倡导“知耻而后勇”却难以“知错而改过”，所以日本的民族性格与日本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暴行有其内在的联系。事实上，日本国内至今相当一部分右翼势力对于历史问题颠倒黑白，其中表现出来的侥幸与投机心理令人瞠目，日本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通过无休止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成功地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可谓尝尽了对外军事扩张的甜头。而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国内许多人对此也并不服气，尤其一直很抵触对东亚国家的认罪，甚至有些右翼极端势力宣扬只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才导致日本的惨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当年根本打不垮“大日本皇军”，这也许正是当前的日本对当年曾对其投掷两颗原子弹的美国毕恭毕敬和对至今仍然占据其北方四岛的俄罗斯畏畏缩缩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一直保持警惕。在20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加紧复活”，“尽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矛头指向何处，目前还难于预料，但它一旦自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凭借它强大的经济潜力和军事力量，向外扩张，就会要在亚洲制造新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重罹侵略战争的灾祸，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比起‘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来，今天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具有更大的侵略野心，也具有更大的冒险性和疯狂性。”一语成谶，尽管时过境迁，当年的时评仍然令人深思。美国当年纵容日本军国主义为其今天的复活埋下祸根，日本国内当下否定其侵略历史的言行基本成为常态。幸运的是历史证据并未湮没，从2014年7月3日开始，中国国家档案局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铁证如山。如果日本政府和民众能够认真研读并引以为戒，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幸事，但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横行甚至把控其国内社会舆论主导权的现实状况，我们的愿望恐怕会落空。

二问：亚太地区的公理和国际秩序如何维护

当前的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践踏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公理，实际迎合了美国遏制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战略需要。简言之，日本人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马前卒，而美国则对日本歪曲历史乃至对外军事干涉有意纵容，完全为了一己自私而罔顾公理。

当前，亚太地区是中美日三边博弈的中心舞台，美国一直希望打造中日疏离而中美、美日联系通畅的“轴心——轴辐”式结构，目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基本呈现这种态势。自2010年，中国以美元汇率计算的GDP超过日本后，中国对亚洲经济贡献率已经超过日本，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出来，东亚“千年中国老大，百年日本为先”的格局不复存在，而日本努力打造的领跑东亚的“雁行模式”将前功尽弃，因此日本国内从政府到国民心态完全失衡，疏华、反华甚至仇华的复杂心态尽显。

当前，美国无力支撑在全球的军力扩张，通过北约围堵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节点上受挫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实际在下降。美国既希望在东亚地区找回颜面，同时必须有效遏制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因此纠集日本、菲律宾、越南这些“代理人”全力打造反华第一岛链，从而配合其重返亚太。这一战略的思路日益清晰，东海和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煽风点火。由于日本在新一轮围堵中国的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其不可理喻的“武士道”精神，美国在一再鼓励日本冲锋抢滩的同时，虽然意识到了日本罔顾历史和践踏正义的副作用，但是也只好暂且搁置，实际上这种祸水东引的绥靖主义做法早已为历史证明是荒谬和反动的。因此，中美两国必须建设性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及时沟通与协商，共同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这才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公理及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正确选择。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中国有义务及时提醒美国，在亚太养虎遗患其实是饮鸩止渴，最终将贻害世人。

三问：如何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

在全球和亚太视野下处理中日关系还是要有耐心和信心，力戒民族虚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误国，在爱国的旗帜下，一味喊打，虽然口号振聋发聩，但是这种民粹化的东西一旦泛滥，会影响我们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甚至会错过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时机。民族虚无主义则害国，貌似“和平为上”，实则没有原则和底线，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秉持健康的爱国主义理念，一方面我们作为全球性大国要积极参与构建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另一方面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信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后续效应还有待评估和观察，纵然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已经绝对不会重演当年日本的“神话”。

英国儿童救助的贫困测量机制

□郭 林 张晓筱

在社会文明水平很高的今天，作为任何国家和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儿童应被赋予享有救助的主动权利。与此理念相对应，英国儿童救助体现了很强的积极性，其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是贫困测量机制。

儿童救助贫困测量机制的运行状况

英国是最早制定收入贫困标准的国家。1950年后，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用“菜篮子法”来测量贫困的方法被废除。1979年以来，英国将贫困界定为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60%。其中，中位数收入是指处于收入分配中间阶层的家庭所获得的税后收入。同时，英国政府以中位数收入60%的贫困线为基准，折算出不同类型家庭收入贫困的货币量。

为隔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英国特别重视儿童贫困。2010年的《贫困儿童议案》提出了测量儿童贫困线的四个条件：一是相对收入，即家庭收入低于当前收入中位数的60%；二是低收入和物质匮乏相结合，即经历物质匮乏和家庭收入低于当前收入中位数的70%；三是绝对收入，即家庭收入少于2010年11月调整后收入中位数的60%；四是持续贫困，即在过去4年中至少有3年的家庭收入少于当前收入中位数的60%。只要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儿童就处于贫困状态。

儿童贫困造成了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消除儿童贫困有助于减少政府社会福利以及其他方面的支出。然而，英国将经济收入作为衡量儿童贫困的参照系在初期对救助贫困儿童有一些积极效果，但不具备可持续性。2003年4月—2010年12月，英国儿童救助花费了17100万英镑的巨额税收收入，但取得的社会效益却非常有限。

同时，仅关注经济收入来确定贫困线的做法并没有反映大多数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现实。2012年6月发布的英国贫困儿童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0月—2010年11月，30万儿童脱离了相对收入方面的贫困，但这主要是由于全国中等收入水平的降低，致使相对贫困线出现了下降。上述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年处于相对贫困线之下的儿童有260万，而2010—2011年，这一指标为230万；2009年10月的相对贫困线标准为每周收入约260英镑，而2010年11月的同一指标则降为每周收入约250英镑。事实上，对于绝对贫困的儿童和30万所谓脱离贫困的儿童来说，其生活状态并无积极的改善。

儿童救助贫困测量机制的未来走向

2012年11月，英国政府提出应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贫困儿童问题。为更好地把握贫穷儿童总数的增长、儿童的贫困程度和贫困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儿童等状况，英国政府提出了并努力推行儿童贫困的多维测量方案。

收入和物质匮乏状况。家庭收入对儿童生活中的各类机会有着重大影响，其将是多维测量措施的中心维度。一般来讲，无业家庭中的儿童物质匮乏率较高。英国低收入家庭中有24%的14岁青少年辍学，中等收入家庭和高等收入家庭的同一指标值分别为14%和8%。同时，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贫困状况会对儿童的卫生和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收入和物质匮乏为测量儿童贫困的核心指标。

失业状况。失业尤其是长时间的失业，会对家长的社会信任、人际关系、健康和福祉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对其子女造成负面影响。1994—2010年，英国失业家庭中55%的儿童为最底部20%的低收入人群。所以，对儿童的贫困测量不能忽视其家庭的失业状况。

难以偿付的债务状况。债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被衡量，如当前拖欠的账单和付款可作为一个主要的财政困难客观指标，个人能力之外支付账单的金额也是考察债务的关键方面。难以偿付的债务不仅使家庭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儿童的最基本需求，而且会对父母工作造成障碍，增加家庭破裂的风险和造成家庭成员精神上的痛苦，这些都影响到家庭中的儿童成长。因此，应将难以偿付的债务纳入到儿童贫困测量的维度体系。

住房条件。住房条件差的衡量包括3个标准：过度拥挤、长期未经修葺、不能充分供热。2005年，每4个英国儿童中便有1个居住在“条件差”的房子中。住房条件对儿童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于年久失修房子中的儿童分别有25%和19%患有长期疾病或残疾。所以，儿童的贫困测量应充分考察其住房条件。

父母的技能水平。父母的技能水平是决定其家庭是否会处于贫困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低技能水平增加了父母失业和工作报酬低的可能性，易带来家庭贫困，对儿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父母的技能水平应在儿童贫困测量中占有一席之地。

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早期缺少优质教育的儿童意味着其从开始上学时起，就已经落后于同龄人。2009年，平均每五个贫困家庭的儿童中，只有一个获得5个及以上的GCSE证书（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成绩浮动在A~C之间，而近四分之三的富裕家庭儿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则不能说儿童处于非贫困状态。所以，把握儿童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是测度儿童贫困的重要维度之一。

家庭稳定状况。2010年英国基于已婚或伴侣关系、同居和单亲三种不同家庭状态，来测量相对贫困儿童的比例。家庭稳定与否影响儿童的生活机会。经历过家庭破裂的儿童与其成人后的低收入经济水平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被卷入父母冲突的儿童容易从家里出逃，在学校表现也不太好，导致在未来处于低收入水平。家庭稳定状况应为测度儿童贫困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父母的健康状况。父母不健康的儿童面临着更大的相对贫困风险。父母残疾会增加其失业的风险，很多儿童和青少年长时间照顾家庭病患者而错过很多学校学习和工作机会。2010年，生活在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家庭中的儿童有32%处在低收入水平，没有残疾成年人家庭中儿童的同一指标值为21%。经历精神疾病的人可能会比普通人多出3倍的债务，进而对儿童经济状况带来负面效应。父母的健康欠佳，影响儿童的教育结果，导致其成人后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进而影响其生活机会。父母健康状况不佳家庭中的孩子也许会经历目睹父母酗酒、滥用药物等状况，这对其心理和行为施加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多维儿童贫困测量机制将结果型维度与过程型维度相结合，能够较为准确地瞄准需要救助的儿童。多维儿童贫困测量机制将一系列的指标结合到单一的数字（收入和物质匮乏值）中，可当某些因素在儿童贫困中发挥更大作用时，通过提高因素指标权重来反映事实，进而使得政府能够制定更好的政策来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多维儿童贫困测量机制能用来把握英国处于多维度贫困中的儿童总数，可经由展示一个儿童的具体贫困程度，了解哪些儿童群体最需要救助，可显示贫困如何影响少数民族或残疾等不同群体的儿童。可以说，缓解和破除儿童贫困是英国整个反贫困战略的关键目标，瞄准贫困儿童的多维测量机制可通过其多种功用，为剀切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西方社会

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逆流

□林东 方珂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是甲午之后的第二个甲子年，中日经济贸易交往日益深入，这个时候最容易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中国人不愿意回忆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淡忘历史和戏说历史的传媒弱点被日本右翼利用，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背后的军国梦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天天盯着中国，特别是中国有关二战的电影和电视，一旦看到中国影视中少了英雄主义精神，多了晚清宫廷色彩，特别是胡编乱造抗日题材、把抗战历史低俗化的现象，就以为抓住了机会，以为中国人民真正忘记了历史，于是变本加厉地恢复宣传军国主义，以歪曲历史应对戏说历史。这几年日本媒体没少歪曲中国形象，为安培解禁集体自卫权打下了社会基础。今天，在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之际，一些中国媒体已经觉醒，深入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让那些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的友好人士充分认清安倍复辟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认识到军国主义复活对我国家安全的危害。

中国人看似为顾全中日友好局面而不直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思潮，被日本右翼视为软弱的妥协，更加助长了反华的嚣张气焰。战后中国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放弃了政府对日战争索赔，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总会充分考虑日本的感受，以和平友好的主基调，来避免因某些问题与日发生直接冲突争执，从而影响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中国人热爱和平、不计仇恨，一直秉承着和平共处的理念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对被侵略的那段历史在两国交往中也点到为止，把主要精力放在共谋发展的大局上来。但这种善意却被日本右翼分子所曲解、所利用，认为今日之中国一如晚清时期那样腐败懦弱，频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挑战我方底线。部分右翼分子甚至将我放弃战争索赔视为软弱的妥协，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更变成否定侵略的佐证。这次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前，日本浩浩荡荡出动50多说客，执政的和在野的都来了，试图以主动的形式上沟通给中国人一个面子，然后继续行不义之举。可惜，他们误判了今天中国人的决心。

中国人不能为安倍解禁自卫权提供下台阶的理由，认清所谓解禁自卫权就是矛头对准中国，难逃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责。应当看到，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对中日友好的又一次无情践踏，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挑衅。日本前途正被安倍等右翼势力所裹挟，重新开始踏上军国主义这条不归路。我们应充分认清危机，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中国人民需要重新扛起正义旗帜，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与野蛮，向世界说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滑入军国主义历史泥潭的实质性一步，而日本军国主义化针对的最大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向中国寻求冒险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日本右翼内心有赌国运的冲动。对此，我们要针对性地加强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不测事态。

安倍的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自卫队恢复军队、日本恢复战争权力开辟了通途，亚洲走向何方成为一个未知数。在亚太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国要鼎立历史潮头，稳住历史前进的大舵。

支持韩国反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立场，团结亚洲各国共同谴责日本的倒退行为，这是中国履行世界大国的责任和义务。要让亚洲各国都明白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仅是对中、韩等邻国的挑衅，也是对战后秩序的破坏与践踏；不仅将危及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乃至世界和平都将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要主动向亚洲各国人民说清楚，安倍政权挑衅中国，就是挑衅亚太和平，中国不安全，大家都不安全，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先侵略中国、韩国，得手后再侵略亚洲各国。如果各国对日本今天的行为视而不见、姑息纵容，那么最终受害的绝不单单是中、韩。因此，应团结那些二战中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谴责、惩罚日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做日本人民的思想工作，团结反战的日本民众共同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安倍一意孤行推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中，大量日本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显示出日本民众的和平理念并没有完全被右翼政客所蛊惑。虽然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国家行为，但毕竟是安倍一手强制主导的，在日本国内包括民主党、社会党等各个党派都发表了抗议的声明，这就是一个反对的基础。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与日本民众的沟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共同遏制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在这个历史时刻，千万不要把板子打错人，不要做伤害日本人民感情的事情，要理智和睿智地反击，展现打击遏制日本右翼军国梦逆流的战略智慧。

对日本极右势力和支持者进行制裁。应该认识到，支持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怂恿日本再次踏上军国主义这条不归路的主要还是日本极右翼分子，破坏中日关系发展及地区和平稳定局势的也主要是这一撮极右翼分子及其支持者。为维护并发展战后体制、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有必要对那些极右翼分子以及公开支持日本军国梦的其他国家一些极端分子进行有力制裁。特别是要把制裁这个武器用到位，当然要避免用在制裁老百姓上，而是制裁那些政治野心家和不负责任的企业家、智库身上，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挑战战后秩序、破坏和平应有的惩罚。